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三十周年

社会主义问题论文集

中国人民大学
科学研究处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主义问题论文集

中国人民大学
科学研究处

中国人民大学

说 明

社会主义问题是科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在校三十周年科学讨论会上，我们把这个问题作为重点进行了讨论。对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深入地进行研究，现将有关的部分论文汇集成册，供参阅，希读者指正！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处

1980年12月

目 录

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划清空想与科学的界限·····	黄达强 (1)
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郑建邦 石永义 (14)
十月革命后列宁论经济落后的国家	
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	刘佩弦 曾曼西 (26)
如何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	
几个问题·····	汪永祥 丁叶来 (44)
社会主义国家政体问题的探讨·····	高 放 (61)
——关于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刍议	
关于供给制的几个问题·····	许文惠 (84)

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划清 空想与科学的界限

黄 达 强

(一)

自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后，空想社会主义从总体上来说，就已破产，退到历史舞台后面去了。但是，作为一种思潮，它并没有完全消声匿迹。一方面，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门徒曾经死守他们老师的旧观点，著书立说，出版刊物，买地办社，折腾了一番。另一方面，在一些民族国家的土壤上，又产生出具有不同特点的空想主义。即使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了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空想社会主义仍然冒出来，侵蚀工人阶级队伍。^①就以马克思的故乡德国来说，这时空想主义思潮相当严重地威胁着德国工人运动的方向。马克思于1877年10月19日给左尔格的信中表示了他的担忧和愤慨，说：“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

① 恩格斯在1880年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空想主义者的观察方法曾经长期地支配着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所有社会主义者直到最近都还尊崇这种观察方法，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也是这样。”“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

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①列宁在俄国革命活动中也同样碰到过空想主义者的干扰，不能不进行揭露批判。他在《两种乌托邦》中说：“在现代俄国，有两种政治乌托邦最牢固，并且由于有诱惑力对群众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这就是自由派的乌托邦和民粹派的乌托邦。”^②这里，我们不打算对这些空想主义的具体情况、特点进行评介，只是为了说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后，空想社会主义流派思潮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

长期以来，我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中，都比较忽视这方面的问题，无形中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空想社会主义流派、思潮不再存在了，至少也是微不足道了。显然这是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估计相左的，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固然在这期间，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比起其他机会主义流派（如普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等），影响要小，但决不是没有这种思潮，也不是不曾造成危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是否可能出现空想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者会不会犯空想主义的错误，这就更没有引起注意了。从几十年实践的经验教训来看，这是一个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的问题。

（二）

回顾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1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9页。

宁主义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制订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因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使在近代史上一直被欺凌、被蔑视的，孱弱不堪的中华民族，重新强大起来，跻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在这三十年中，也遭受了两次严重的挫折，一次是1958年的“大跃进”，一次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两次挫折，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原理，混淆了空想与科学的界限，试举数例。

在生产水平很低（基本上还是手工劳动）的情况下，急忙搞“一大二公”的公社化，短短数月时间，一哄而起，把全国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农户都组织到人民公社。强调公社包含全民所有制成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由此大刮“共产风”，公社共生产队的产，生产队共社员的产。在十年“大革命”中，又一再强调提高公社的公有化程度，加速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为基础过渡到以大队、公社为基础，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全民所有制实现越早越好。

大力宣传供给制加工资制是社会主义现阶段理想的分配形式，认为供给制就是按需分配，供给制的比重越来越大，工资比重越来越小，便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了。因此，在农村曾经积极推行包吃、包穿、包医、包教、包生、包葬等包干制，在职工干部中也酝酿恢复革命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把按劳分配这个分配原则，把八级工资制这个分配形式当作资产阶级权利来批判。

笼统地把商品生产和货币看作是产生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温床。看不到不同的生产方式下商品生产具有不同的性质，看不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货币存在的必然性，希图在落后的小生产的基础上进入无商品无货币的社会。因此，在工农业生产中不是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而是限制商品生产。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企业、生产队不能有自主权，不能有竞争，不能有奖金，农村不能搞家庭副业，不能搞集市贸易。这实际上就会成为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想人为地用高往低靠、高低拉平的办法来缩小三大差别。特别是在“兼学别样”的号召下，知识分子下放当工人、农民，脑力劳动者下放从事体力劳动。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实际上变成了否认必要的社会分工，否认科学知识、否认脑力劳动的作用。片面地宣传“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知识分子最没有知识”，“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等等，使各种专门家的存在，科学文化教育机构的存在都成了问题。

由于以小生产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所以头脑发热，急于求成，搞脱离现实可能性的建设高速度、生产高指标。从主观愿望出发，轻率地提出国民经济或某几项产品一年翻番甚至翻几番的任务。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动辄搞全民大办：全民大办钢铁、全民大办粮食、全民大办水利、全民大办社有经济，全民大办土铁路，等等。结果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不顾主客观条件成熟程度如何，在生产、生活水平都还很低的情况下，想按全民皆兵的方式组织群众过半军事的生活，大办集体劳动营连和集体食堂，强调个人生活集体化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平均主义、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既不符合人民群众自愿的社会主义原则，也不适应现阶段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的需要。

片面宣传一穷二白是好事，以穷为荣，认为穷是动力，穷则革命。把穷同社会主义相联系，把富同资本主义相等同。由此，不急求发展社会生产，不急求增加社会财富，不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调整生产关系，根据主观愿望搞穷过渡，不重视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在“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接连进行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希图建立一个最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不惜时间、人力、资财，发动自下而上的“造反”，不仅打破了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秩序，而且冲击了从中央到

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冲击了几十年来形成的革命统一战线。结果同自己的愿望相反，天下大乱，内战不已。

把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同大搞群众运动等同起来，宣传什么工作都要大搞群众运动。而大搞群众运动又同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联系在一起。于是，每搞一次运动就造成一次大动乱；接连不断搞运动就造成长期的大动乱。

夸大思想理论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迷信它们的万能力量。正是从这里出发，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规律，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急于求成，搞了诸如上述的主观空想的事情。

从以上数例可以看出，我们在两次挫折中，在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犯了“左”倾空想的错误。从表面看来，它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愿望，有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群众运动，又有严格的集体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无疑地是真诚的搞社会主义。但是，它忽视了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人口多，底子薄这个最关键的实际，这就只能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小生产的、贫困的基础上，用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办法来达到“有饭同吃，有福同享”的理想。这样认识社会主义，就可能导至“左”倾空想的错误。

(三)

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比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甚至也比十九世纪初的三大空想家，表现出了更强烈的革命精神。例如让·梅叶，他坚决主张用革命暴力推翻剥削制度，建立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按地域组织公社，财富共有，共同劳动，享用相同的住房、衣着、饮食，过平等的生活。马布利对私有制深恶痛绝，要求不惜用革命和内战手段建立一个“人人都是富人，人人都是穷人，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共和国。但他主张清心寡欲的生活。

摩莱里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主张以没有剥削压迫的公有制社会代替私有制社会。但他也是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甚至把脑力劳动当作特权予以取消，以颁布法令取消社会分工。巴贝夫亲身以英勇的革命暴力行动为建立“平等共和国”和“国民公社”而斗争，但他同样主张“均等分配”，每人得到同样的一份。所以，马克思把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概述为“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① 恩格斯称他们为“苦修苦练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② 这都是很恰当的。

十八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特点，是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充分发展，小农自然经济还占很大比重所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③ 生产力水平低，产品不丰富，只能以平均分配来实现共同享受，又只能以禁欲主义作为平均主义的保证。

众所周知，我国在革命胜利前也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广大农村基本上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束缚中。在我国，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社会理想也源远流长。历代农民起义的首领多以“平等”、“平均”作号召。从东汉张角的“太平道”，到南宋钟相的“等贵贱，均贫富”，到太平天国洪秀全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都曾扯起平均主义大同世界的旗帜。在这个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中国革命者，有可能受到这种历史条件的影响。尤其是我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村包围城市，为数众多的党员干部，出身于农民小生产者，又长期生活战斗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过着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生活，对资本主义大工业，对社会化大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6页。

③ 同上书，第409页。

产极为陌生。因此，在领会马克思主义、实践科学社会主义时，有些同志可能把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误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另外，象我国这样经济还很落后的大国，取得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都有一种压力，希望我们尽快繁荣富强起来，这又容易触发起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构思出脱离现实基础的、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左”倾空想的蓝图。

可见，“左”倾空想错误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经济的、历史的原因，不仅仅是个别人物的偶然失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革命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应该警惕这种错误的发生。列宁说过：

“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①列宁的话，不仅被他的国家的实践证明，也为当今有的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以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同十九世纪初三大空想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有所不同，一般都主张以激烈的革命行动推翻剥削者统治，消灭私有制，组织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但他们的具体主张往往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脱离客观实际，违背客观规律，因而表现在政治路线上是“左”倾机会主义。

我国在两次挫折中，“左”倾错误是明显的。以上讲到的几个方面，既是空想的表现，也是“左”倾的表现。这种“左”倾错误为害之烈，是尽人皆知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搞了种种实验，至多只是使自己或少数人倾家荡产的话，那么，当掌握了政权以后，搞“左”倾空想，其后果要严重得多，说它会导致国家和人民的巨大损失决不是危言耸听。

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犯“左”倾空想错误，这同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不相同的，他并不存在系统的空想主义理论体系，而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思想理论一度偏离科学社会主义某些原理而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9页。

犯错误的。一般来说，这种错误能够自己起来纠正。因为他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当错误的严重后果表现出来以后，能够从革命立场、人民利益出发，正视错误，吸取教训，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从而更自觉更成熟地站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阵地上来。毛泽东同志对革命者犯错误曾经作过科学的分析：“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①当然，如果革命者所犯的“左”倾空想错误被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野心家、阴谋家利用，让他们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把“左”倾空想推向极端的时候，那就会造成另一种局面了。

我们两次挫折中，头一次错误由我们自己初步纠正了，说它是“初步”，即不是彻底纠正，主要表现在没有对错误的性质、后果、根源作严肃认真的总结，没有对如何改正错误、吸取教训作出必要的结论。由此，才又发生后一次更严重的错误。而最后一次错误，就被林彪、“四人帮”、康生、陈伯达这些阴险的敌人利用了。在他们所直接控制的地区、部门，实际上搞的远远超出“左”倾空想范围，而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使我们整个民族，遭受到空前的大浩劫。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痛苦的挫折中奋起，打倒了恶贯满盈的“四人帮”，纠正了“左”倾空想的错误，我们重新走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划清空想与科学的界限的基本保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坚持唯物主义，坚持唯物史观，这样，我们就能牢固地站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2—283页。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地上，去争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建成。

(四)

怎样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划清空想与科学的界限呢？这里，提出以下三点：

一、不能以感情代替科学。

信仰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而英勇奋斗，这种革命精神是十分可贵、十分需要的，但是并不能以此作为判断科学社会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的依据。历史上的许多空想家对社会主义的忠贞，直到今天还是感人肺腑哩！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因为坚持自己的社会理想，蹲过的黑牢有几十处，坐牢的时间三十多年，受过中世纪最残酷的刑罚，但他从来没有屈服，更没有动摇自己的信仰。他就在地狱般的囚牢里，冒着随时被处死的危险，写出了光芒四射的《太阳城》。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闵采尔，为建立“千载太平天国”，组织领导无产者和农民拿起武器英勇战斗，负伤被俘后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走上断头台。法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密谋武装起义，因叛徒告密被捕。在法庭上他痛斥敌人，在刑场上视死如归。临刑前他给妻子的遗书中说：

“我是为了最伟大的和最崇高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的”。他希望他的孩子继承这个事业，一有可能就毫不迟疑地投身到这项任务中去。欧文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耗尽了自已巨大的资财和全部精力，直到八十多岁的高龄还风尘扑扑，奔走呼号。这些社会主义先驱者们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精神和坚定信念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他们毕竟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而只能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所以，有真诚的社会主义愿望，不等于自己为之奋斗的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一个人对社会主义事业忠心耿耿，不等于不会犯“左”倾空想的错误。社会主义是科学，来不得感情用事，需要的是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它、实践它。即使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

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有真诚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愿望，仍然有许多因素，包括这个科学本身的特点这个因素，可能使我们混淆空想和科学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成果而创立的，这就决定了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既有区别(这是主要的、本质的)又有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都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都要求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都要求建立平等的新社会。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若干特征方面，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相似、相近的地方。相似、相近不是相同，如果我们不注意它们之间本质的区别，就容易发生混淆科学与空想界限的情况。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区别，它们之间的最根本的分界线，在于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如果在唯物史观上动摇、偏离，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就将发生“左”倾空想的错误。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由于在唯物主义世界观问题上发生偏离，进而导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偏离，是完全可能的。可见，对社会主义的感情，和社会主义科学是两回事，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需要革命感情，但是更需要完整、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科学。

二、不能舍科学社会主义之本，逐空想社会主义之末。

什么是社会主义？对此，空想社会主义者有过五花八门的答案，有过具体生动的描绘。即使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光辉思想，也仅仅是提供了启蒙工人阶级觉悟的宝贵材料。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空想社会主义的作用与历史发展恰成反比，是社会主义运动中一支末流，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就要紧紧抓住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而要避免“左”倾空想的错误。

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什么？经过这几年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重新学习探讨，我们终于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了，这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剥削和按劳分配。但是在讲这三条的时候，不能忘记一个前提，就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就是说，这三条是建立

在社会化大生产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上的。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的同志正是由于忘记了这个前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便产生了偏差，以为不管生产力发展水平如何，只要搞“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就完全实现社会主义了。于是，只要把“按劳分配”改为供给制，就是实现按需分配了，就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样理解不正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社会吗？梅叶、摩莱里都把原始社会看作人类的“黄金时代”，马布利把古希腊斯巴达社会作为自己社会主义理想的模式，巴贝夫也把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上的“国民公社”作为社会主义的美景。所以，只有在明确社会化大生产是前提的情况下，讲上述三条特征，才能把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马克思讲过：“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①这说明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性。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重要的一点是想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上。

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必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有经济基础方面的特征，也必然有其上层建筑方面的特征，不过它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特征是什么？我认为也有三条：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充分完善的人民民主制度和丰富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三条的核心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不抓住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条，就把握不住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特征，没有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没有人民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今天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中提出建立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高度民主、高度文明”，就准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特征。

我们认为，只有把社会主义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特征统一起来理解，才能抓住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实践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

才不会舍本逐末，混淆界限。

三、不能以政治权力、政治权威来代替人民群众实践的检验。

社会主义还在实践中。社会主义不可能只有一个模式。社会主义必然象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一样，具有多样性的形式。究竟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是否科学，这要由人民群众来检验，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划清空想与科学的界限，不应该求助于理念，而应取决于人民群众的实践。

在两次挫折中，我们却习惯于用政治权力、政治权威的标准来判断真假是非。凡是经典著作、权威人士说了的，就认为都是正确的、科学的，不容置疑的。因此，人民群众在这种现代迷信的思想束缚下，又怎能及时区分科学与空想呢？我们都很记得在“大跃进”的日子里，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所推行的一些“左”倾空想蓝图，几乎都是在“群众运动”的磅礴气势下展开的，在那个时候怎能允许人民群众去检验真假是非呢？但是在这两次挫折中，确有千千万万的人们用实践标准检验了它，先后发现了问题，对这种“左”倾空想产生了抵触，少数先进分子进行了抗争。当然这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当时通行的毕竟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威的标准，而不是人民群众实践的标准。如果通行的是后一种标准的话，人民早就发现，我们的“大跃进”确实是大冒进，我们的“冲天干劲”确确实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我们的“大革命”确确实实是带来大破坏，大倒退。正因为没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检验的权利，导致了巨大的悲剧和危机。我们要吸取的教训，恰恰是要尊重人民群众实践的检验。社会主义既然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是人民群众的崇高理想，人民是社会主义的主人，他们应该有最大的判断真假社会主义的权威。应该把这个权威赋予人民。这样，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一定会少走弯路，少受挫折，使科学的社会主义取资本主义而代之。

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三十多年来，创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几经曲折。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史上的正常现象。开创一种崭新的社会

制度怎么可以设想一帆风顺呢？重要的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相信和依靠人民去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